绪 论

早早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文明”这个词就已经出现了。在我国，“文明”这个词最早见诸文字大概要首推两千多年前的《周易》。《易传·文言》中有“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之说。多少世代以来，人类精神文明的演进经历了从古代文明到近代文明，从近代文明到现代文明的历程。这期间“文明”一词已融进了人们对光明美好未来、对社会进步发展的执着追求，不断扩展着自己的内容。

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已经历了近半个世纪，这半个世纪的后20年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则是中国改革开放走向新世纪的20年，也是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20年。这20年是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时期，也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最辉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一页。人们还都记得 20 年前，讲贫穷的社会主义还是理所当然的。今天，不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就是精神文化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

我们知道，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除了需要物质资料以外，还需要精神生活和精神生产。社会进步的基础是生产力发展，但社会进步和开化的状态所体现的文明，则应该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进步。物质文明指的是改造自然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精神文明是社会精神生活的丰富程度和精神成果的总和，包括教育、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两大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考察历史上社会总体文明程度的发展时，从来认为它是通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交互作用实现的。两个文明紧密联系，又各自具有相对独立性，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但精神文明不是物质文明的附属品，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特殊性。精神文明在历史唯物主义体系中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范畴，必须把精神文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客体和对象去认识、去建设。那种过分强调精神文明对物质文明的依附性，进而陷入片面的“经济决定论”是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相悖的。正因为如此，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十五大，中国共产党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同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要实现的重要目标，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在这方面有诸多论述，他们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是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三座伟大的里程碑，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是我党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来源。马克思提出培养有觉悟有文化“全新的人”，没有这种“全新的人”不可能建设高度文明，更实现不了共产主义的论断；列宁提出在文盲大海里建不成社会主义，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的论断；毛泽东提出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生命线和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论断，等等思想观点，至今仍闪烁着光辉。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在指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论点，对我国当代精神文明建设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 20 年的伟大实践，是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理论、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方针、政策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也是党采取一系列重大部署和举措不断加大精神文明建设力度的过程；同时又是在邓小平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精神文明建设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不断结出丰硕成果，把精神文明建设推向前进的过程。本书主要阐述的就是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为了深刻地认识 20 年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揭示未来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的规律，我们不能不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领导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作一简要的回顾。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取得了不少可喜的成果，但也有徘徊，甚至有倒退。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得还是比较顺利的，通过富有

成效的努力和工作，取得了可贺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其一，通过组织并开展的大规模的政治学习运动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脱离了内外反动派的政治与思想影响，对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及其方针政策有了基本认识，初步树立了劳动光荣和为人民服务光荣的思想，增强了主人翁责任感和爱国热情等等。这是解放后中国人民在政治思想和精神面貌方面的第一次大飞跃，也是新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第一项重点工程”。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对自身队伍中的思想建设抓得既紧又见成效，主要是通过整风和“三反运动”教育了大多数干部，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刘青山、张子善等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旧社会的恶势力和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使广大干部保持了清醒的头脑和旺盛的革命斗志，对于形成健康有序的社会风气，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另外，通过有计划、有组织地出版发行大量的马列著作，尤其是《毛泽东选集》的陆续出版发行，在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掀起了广泛的学习热潮，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得到空前的传播，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其二，恢复和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提出“双百方针”。在教育方面，党确立了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向工农开门的总方针；同时人民政府还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工农兵中开展了一场扫盲的业余教育活动，对于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在科研方面，自 1949 年 11 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到 1955 年底，全国专门的科研机构已达 800 多个，专门科技人员超过 40 万人，使我国科学事业的迅速发展有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在党的

“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我国的文艺工作开始复苏、繁荣和发展，大批优秀的电影、戏剧、小说、散文等文艺作品相继问世，这对于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振奋民族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出台，已经迅速成长壮大的广大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和工作积极性极大提高，他们掀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其三，在改造与建设中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通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增加生产，厉行节约”运动的开展，使爱国主义成为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动各项社会改革的巨大精神动力。其四，通过取缔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社会丑恶现象，通过镇反运动，肃清了封建思想余毒，广泛开展了移风易俗活动，从而建立了新的生活秩序。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践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成绩是很大的，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良好开端。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这个阶段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还处在初始阶段，还有很多方面有待完善和发展。

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经历了曲折而又渐进发展的历程。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继续向前发展，并取得了新的成就。同时，由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错误，精神文明建设也发生了“左”的偏差，出现了曲折。这一段精神文明建设的突出成果有两项：一是在思想建设方面。为了偿还前苏联的外债，顶住前苏联政府片面撕毁合同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克服“大跃进”错误和连续 3年自然灾害造成的暂时经济困难，党和政府及时提出并大力弘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在党中央“自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更生，勤俭建国”的号召下，全党和全国人民表现出毫不畏惧外来压力的骨气和自强自立的斗志。这说明中国人民的精神素质得到了提高。另外，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学习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英雄模范人物的活动，全民精神文明水平大大提高。这也把解放后形成的良好社会风气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二是在文化建设方面。在教育方面， 10 年间高等学校为国家培养输送了 139 万大学生，为前 7 年的 4.9 倍；中等专业学校的毕业生有 211 万，为前 7 年的 2.3 倍；普通中学和小学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在科技战线上，在非常薄弱的基础上取得了十分明显的成绩。到 1965 年，全国科研机构已达 1714 个，科研人员达到 245.8 万人。李四光创立的地质力学理论及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的成果等，填补了现代科技领域的空白。在体育领域，中国在乒乓球项目上取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摆脱了旧中国“东亚病夫”的屈辱称号。在文化艺术方面，创作出版了一批优秀小说和戏剧，诸如《青春之歌》、《茶馆》等等；发表了毛泽东诗词；拍摄了《林则徐》、《红日》等一大批优秀电影。这些成果，为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增添了新的光彩。同时，这一段精神文明建设也出现了偏差：一是共产主义宣传庸俗化，教条主义、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滋长，过分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片面追求脱离实际的高速度、高指标，浮夸风盛行，严重地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了共产主义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二是对知识分子政治倾向和科学文化事业的错误估计和批判。1957 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很多知识分子，包括不少知名人士被打成右派。这造成了知识界的窒息和困厄局面，严重地伤害了广大知识分子的感情。

十年动乱时期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出现了历史滞退。这10年，我国从古至今积累起来的宝贵的精神文明成果遭受了空前浩劫，全社会出现了“精神的荒原”。主要表现在：其一，“文革”造成了思想大混乱。“文革”荒谬地把“斗私批修”作为思想领域的基本方针，提出“走资派”、“修正主义”等错误概念，大搞个人崇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被肆意歪曲，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泛滥，造成了极大的精神污染。其二，教育科学文化事业凋敝。“文革”一开始就全盘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科学知识的价值。1966—1976年，我国高校停止招生11年，以保守数字计算，共少培养大学毕业生385万人。“文革”加剧了我国人才缺乏的矛盾，耽误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使我国成人文盲增加到2亿多人。另外，“文革”给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带来了大摧残：几千年来的文明成果被否定；各种珍品、典籍、文物、古迹遭到毁坏；大量优秀文艺作品被批判；文艺刊物、团体、机构遭到查禁。整个文艺园地荒芜凋零。另外，我国科技事业也遭到重大冲击，机构解散、项目停止、交流中断，从而拉大了我国科技水平同先进国家的差距。所有这些，对我国精神文明建设造成了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其三，社会道德水平大大下降。“文革”搞乱了善恶、美丑、荣辱、毁誉等观念，在社会道德领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不测的政治风云，使人们互存戒心，不敢以诚相待，从而极大地破坏了人与人之间团结、友爱、互助的正常社会关系，败坏了我国建国以来形成的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其四，严重挫伤了建设精神文明的基础力量——知识分子队伍。在“文革”中，许多知名人士被扣上“反动

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帽子，因“莫须有”的罪名而横遭迫害；广大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一大批冤假错案极大地伤害了知识分子队伍。总之，“文革”一方面使我国已有的精神文明成果遭到了空前的洗劫；另一方面又使我们的社会滋生了许多假、恶、丑的不良风气和野蛮现象。当然，在“文革”的坚冰之下，也有激流：1967 年“二月抗争”中一部分老一辈革命家为捍卫党和人民利益而大义凛然进行坚决抗争的精神；共产党员张志新烈士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为捍卫真理而坚贞不屈的献身精神；1976 年清明节前后产生的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声讨“四人帮”要求建设现代化的“四·五”精神等等。这些都是在“文革”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特殊成果。

1976 年 10 月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干部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教育科学文化工作开始走向正常。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开始逐步认识到“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的危害，要求进一步消除精神障碍。然而，由于一方面，长期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造成的思想混乱不可能在两年内迅速消除；另一方面，主要是来自当时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坚持“左”的错误，使党不可能立即完成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任务，“左”的意识形态仍然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所以，这两年精神文明建设的工作虽取得一些可喜成绩，但总的看来成效不大。 1978 年 12 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新时期党对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探索、

决策的历程从此开始。

回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按照我们党的认识、探索和决策的线索来划分，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历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新时期的开始阶段（1978 年 12 月至 1981 年 6 月）；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方针和政策的初步形成阶段（1981 年 6 月至 1986 年 9 月）；三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形成和系统化阶段（1986 年 9 月至 1992 年 1 月）；四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日臻成熟和渐趋完善阶段（1992 年至 1997 年 9 月）。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时期

历史的转折

1978 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毫无疑问它也实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历史转折。这次会议的胜利召开及取得的重大成果，为挽回“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造成的巨大损失，结束两年徘徊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展不快的局面，夺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新的胜利，实现新的战略目标，提供了条件，打下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在思想上，全会坚决地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强调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全会高

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方针。全会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于包括自己在内的任何人，始终坚持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党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就是领导、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这不仅对于重新确立党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全面认真纠正过去工作中的“左”的错误，把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集中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目标上来意义十分重大，而且为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拨乱反正，深入开展理论研究，确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地位，全面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政治上，全会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应当按照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的方针去解决，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全会指出，党在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动员起来，群策群力，为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进行新的长征。全会作出的这个全局性的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略决策，恢复和发展了党的八大确定的正确方针，是对长期以来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的根本的拨乱反正。这不仅标志着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的重新确立，同时也为“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伤害的广大知识分子恢复了名誉，动员他们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发挥更大的力量，作出新的贡献，从而为发展与壮大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队伍，在政治上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在组织上，全会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大批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全会指出，1975 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全会审查和纠正了过去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同志所做的错误结论，肯定了他们对党和人民的贡献。全会认为，只有坚决地平反假案，纠正错案，昭雪冤案，才能巩固党和人民的团结，维护党的威望。全会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不仅为如何解决“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冤假错案树立了榜样，而且也为彻底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解决好“文化大革命”中的遗留问题，从组织上给予了有力保障。

在党风建设上，全会根据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决定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健全党规，严肃党纪；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一切不符合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的做法应该坚决纠正。在法制建设上，全会讨论并明确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

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全会在这方面所获得的成果，对于扭转“文化大革命”以来社会道德水平明显下降的局面，对于通过法制的途径彻底改变不良的社会风气，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并且对于我国长远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全会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各方面进行改革的任务。全会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同时，要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并大力加强实现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这些思想的提出，不仅是党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重要方针的开端，而且对于确立新时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奋斗方向，对于如何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抓好上层建筑方面的工作，切实搞好科学和教育工作，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指明了奋斗的方向，具有极深远的意义。这必将推动今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事业的繁荣和发展。

导航指向的四项基本原则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社会上又出现了思想混乱的状况，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思想动向。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思想不解放，没有从“左”的束缚中

解放出来，甚至还有极少数人攻击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一段时间内，有些地方出现了少数人闹事、采取不轨行动破坏社会秩序的现象。更有甚者，他们打着“民主”的幌子，蒙蔽群众，扬言“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无耻诽谤毛泽东，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思潮，在一部分群众中间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如果对这些严重现象熟视无睹，对这种思潮不制止，任其发展下去，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要遭到破坏，思想解放运动就会误入歧途，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就很难贯彻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1979 年 3 月 30 日，邓小平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政治思想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在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后，逐一批驳了怀疑和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他说，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中国离开社会主义就必然退回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绝大多数人决不允许历史倒退。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不可能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

国。当然，党的领导不会没有错误，但决不能以此为借口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党和人一样，可能犯错误也能够改正错误。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

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后，邓小平又多次阐发了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如何正确理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1980 年 1 月 16 日，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针对一些怀疑党的领导的思潮，指出：“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在 1980 年 2 月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指出：“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我们提倡的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提倡实事求是是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1982 年 4 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进一步阐明，四项基本原则最重要的是两条：一条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邓小平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有关论述，不仅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向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政治保证，也为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以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为准则，就能防止“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从而全面深入地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概念的明确提出

1979 年 9 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这个讲

话初步总结了建国以来我们党在领导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也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并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地位等做了论述。叶剑英的讲话指出：“我们所说的四个现代化，是实现现代化的主要方面，并不是说现代化事业只以四个方面为限。我们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段重要论述集中阐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观点：第一，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概念，同时也提出了与精神文明相关的“物质文明”的概念；第二，概括地指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内容，即教育、科学、文化和革命理想、革命道德风尚以及文化生活；第三，明确指出了社会主义要建设两个文明，即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第四，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既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又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一个条件。1980 年 10 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上述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文明观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丰富和发展：第一，恩格斯早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结束语部分特意引证了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写

的一段话，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文明的发展，即“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75 页）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中不仅重申了恩格斯关于文明论述的重要内容，而且又加以充实与提高，明确指出了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精神文明是不可缺少的内容，以及它与物质文明建设的密不可分的关系等，这是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发展。第二，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的《讲话》中提出的关于精神文明概念的有关内容，是针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许多愚昧、落后、野蛮、残忍、卑鄙、丑恶的现象被揭露出来后，说明我国社会还存在愚昧落后的一面，为了在实践中解决中国人民在精神上还存在的愚昧落后的东西，必须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也抓好精神文明建设。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文明，在实践中创造性的运用，也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科学观点在实践中继续进行的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提出新认识

1980 年 12 月 16 日至 25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了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的调整、在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大方针。值得指出的是，这次 12 月中央工作会议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问题列为重要议题进行了讨论。邓小平同志在题为《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中，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